



慰堂先生與臺灣圖書館事業

盧荷生

蔣慰堂先生，是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創辦人，任該館館長多年，後雖轉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但仍心繫圖書館事業，未嘗一日中斷。他對圖書館事業的貢獻，除中央圖書館以外，於臺灣圖書館的發展，貢獻良多，影響尤深。他為臺灣圖書館的發展在根本處奠定基礎，為圖書館員留下了最好的楷模典型，為整個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方向，是臺灣圖書館史上一位拓荒的先進！

慰堂先生真是一位典型的「圖書館人」，因為根據昌彼得先生編〈蔣慰堂先生九十年表〉（見《蔣慰堂先生九秩榮慶論文集》）：「民國九年，慰堂先生即奉其堂叔百里先生之命，參與圖書俱樂部之圖書編目工作，時年二十三歲。」

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先生因時已應聘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達年餘，乃向教育部請辭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獲准。先生共擔任中央圖書館館長三十二年，而參與圖書館工作，先後達四十七年之久。先生的圖書館生涯，前一半在大陸，後一半在臺灣。尤其是臺灣這幾十年來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先生的耕耘推動，實在關係重大。我們如果說「先生是臺灣圖書館事業的拓荒者」，絲毫沒有誇張，也絕不為過。

我們可以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談他對臺灣圖書館事業的貢獻。首先是慰堂先生為臺灣圖書館事

業發展建立了一個正確的認知方向。他深深知道，圖書館學最基本、最可貴的精神，就是在應用和實踐，要在服務的活動中，展現圖書館學的真正意義與價值。所以他在南京、在四川、在臺北，都是在別人的眼光裡，連基本的條件也尚未具備之時，就要急著開放。那就是圖書館只有在服務工作進行之中，才能尋找出最好的發展的途徑。館員們工作情緒，也只有有在服務工作正式開展以後，才能逐漸提升起來。這是圖書館學的基本特質，捨此無以為圖書館學。在他一生的圖書館學著作之中，鮮少有只談理論而離開實務。在他的心中，若只專言理論，絕非圖書館學發展之正途。以下分段舉例：

- 中央圖書館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方購得南京市成賢街四十八號（原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房屋一所，並於次年二月五日正式遷入辦公，民國九月六日即正式開放，其間僅隔七個月。共開放參考、報章、期刊、普通四部分。
- 抗戰軍興，政府西遷，中央圖書館於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借重重慶川東師範大禮堂作辦事處。五月一日即成立參考閱覽室，並附設抗戰文庫公開閱覽。
-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中央圖書館遷還南京，當即在新街口設閱覽室，六月二十四日總館閱覽室開放。共有普通閱覽室、參考室、期刊室、日報處及出納處。
- 中央圖書館在台復館，於民國四十四年九月十九日遷入南海路館址後，先後興建閱覽室及走廊，次年三月一日起正式開放，並舉行「中國歷代圖書展覽」。後又於同年六月四日，開放青年閱覽室。

綜觀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慰堂先生無論在哪裡負責館務，都急於開放閱覽，不瞭解他的人，也許會覺得他急於表現，但這其實是他對圖書館學的一種認知和體現。先生研究圖書館學，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改善圖書館的經營，當然必須先讓圖書館動起來，否則只停留在座而言的階段，如何談得上改進？又譬如他當年設立一個青年閱覽室，還每晚請一位在高中任教的老師擔任讀者顧問，為青年學生解答課業，就曾有人表示質疑。以國家圖書館的館務發展而論，設立青年閱覽室，而且那樣重視，確有可議之處。然而，在四十多年以前，圖書館的功能尚是一片模糊，即使在今天，我們不同類型圖書館的經營方針，也尚未分明。當時中央圖書館的位置碰巧在建國中學的對面，有一批急需圖書館服務的中學生，故當時的青年閱覽室常是座無虛設，還屢次有學生為了爭座位而發生糾紛。先生當年不只一次談到青年閱覽室的服務功能，其遠見讓人佩服。說到這裡，一方面讓我們懷念先生的這種精神，另一方面不禁感慨當今一些圖書館員常因謹記圖書館學理論而拘泥固執，缺少一點活用和應變的智慧。我們對於這樣的長者先進，又何能僅止於景仰和尊敬？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如何藉著坐而言的理論，指導起而行的實務，以追求具體而落實的功效，才是正確的途徑。慰堂先生一生的事蹟，應該是我們最好的教材。

其次是慰堂先生深知，若要發展圖書館事業，首先要從事的是專業人員的培訓。臺灣的圖書館學教育，能有今天這樣成就，首先就要歸功慰堂先生，因臺灣的第一所圖書館學校，就是現在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館組，於民國四十四年成立。當時的負責人，諸如田培林教授和孫邦正教授等，都和先生私交甚篤，該系之成立，先生盡力最多。如今臺灣圖書館界，最早的一批

專業幹部，多為該系畢業生，貢獻卓著；接著於民國四十六年春至四十九年二月共歷時三年，先生又以國立中央圖書館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合作的關係，招生六名。上午在師大上課，下午到圖書館實習，修業期限三年，授碩士學位。這是我們圖書館學教育史上的一件創舉，有著許多意義值得探討，可惜後人已對此淡忘，也未曾加以重視，連僅有的相關記載，不是疏漏，就是錯誤。其實有些問題，至今未有解決之道，而當時的做法，頗有參考的價值，也都失之交臂了，詳細情形，我們在後文再來敘述；民國五十年暑假，臺灣大學文學院成立圖書館學系。在三十五年前，想成立這樣一個系，要靠機緣和努力，這是瞭解當年情勢的人都會承認的。當時文學院長沈剛伯教授，與先生相識多年，應該是促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的台大圖書館學系所，從學士班至博士班是臺灣圖書館學教育的重鎮，也記著慰堂先生曾在創建規劃之時的良多貢獻；民國五十三年，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成立圖書資料科。世新成舍我先生，是先生的多年好友，又是崑曲同好，圖書資料科的成立，明顯地是受到先生的影響；至於輔仁大學的圖書館學系，成立於民國五十九年，更是明顯地出於先生的建議。先生篤信天主教，在教會之內受到極高的重視，曾獲教廷頒贈爵士榮銜。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先生奔走協助，居功甚偉，雖後來先生僅在歷史學系執教過，未曾在圖書館學系教過書，但對圖書館學系的成立，先生的貢獻最大，是眾所皆知的。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早期的圖書館學校，除了淡江大學的教育資料科學系之外，無一不是先生所熱心促成的。現在臺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其基礎就是建立在充足優異的人力資源上，而我們的圖書館學校，每年都有差不多近四百人的生力軍畢業，這一個優勢的形成，應該歸功於先生四十年前的眼光遠大，從根本處培養了

圖書館事業的生機。

至於與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合作訓練人才一事，在此必須補敘一筆，否則這一段歷史，將會被遺忘而漏失。慰堂先生是一位圖書館學實踐家，有著豐富的圖書館實務經驗和體會，是單純從事所謂學術研究的人無法覺察的。他從事圖書館工作，知道圖書館員的工作，表面上看起來，只是在處理一些圖書資料，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媒體，但實際上是在處理知識。所以一般來說，圖書館員需要一些工作上的技術，可是工作到了某一個層次，技術以外，更需要知識。因此，對圖書館員的工作能力而言，知識是體，技術為用。有知識的基礎再學習技術，應該比較容易；若只有技術，而知識不足，有時技術將無以為用。因著這個緣故，慰堂先生一直在計畫要培養幾位高層次的圖書館員，招收幾位大學畢業生，授予碩士學位。當時的教育部長張曉峰先生，支持這一意見，答應經費支援，可是中央圖書館不是學校，不能辦教育，更不能授予學位，一時之間問題還是無法解決。巧的是當時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的所長高仲華教授，與曉峰先生是中央大學的老同事，於是商請師大國文研究所與中央圖書館合辦，這是中國圖書館學教育史上最早成立碩士班的一段因緣際會。當時的師大國文研究所採用了「目錄學組」這樣的名稱來培養圖書館的高階人才，這也許是為何後來的人總未警覺，原來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當年的目錄學組，就是最早的圖書館學碩士班。這個班招生的時候，是在民國四十六年二月，春季班所招來的，都是非圖書館學科系的畢業生。當時規定修業三年，課程由中央圖書館負責設計，當然也必須修一些國文研究所的基本課程，特別像我不是中文系畢業的，還要到大學部去補修一些中文系的課程。上午在學校上課，下午要到中央圖書館實習，可

以看得出慰堂先生對圖書館學的一些堅持之處。他對實習很重視，尤其是在四十年後看這件事，更能看出慰堂先生過人的眼光。他對我們實習的安排，實際上就是我們幾個人後來發展的方向。慰堂先生在實習的安排中，有兩點值得注意，同時也是圖書館學校教育的問題核心所在，甚至至今仍然是未能獲得重視及妥善解決。

第一點是實習在圖書館學教育過程中的重要性。圖書館學是一門實用的學科，所有圖書館學的理论，最後仍是希望能夠落實在實務之中，也惟有能夠充分落實於實務的理论，才是可貴而有價值的，因圖書館學的研究，本來就是謀求圖書館在經營上能有更高的成效。所以，我們對於圖書館學的實用特性，不僅不應諱言，還理當給予相當程度的重視。因此，慰堂先生在設計這樣一個碩士班的時候，對實習是極為看重的，他不僅要求在中央圖書館實習，三年之中每天下午都要上班，同時每月發給實習補助費三百元。當時的三百元還算不少呢，再加上當時研究生的津貼三百元，既能唸書又能領到津貼，是相當令人羨慕的。再說，館裡安排實習的內容，在當時雖不以為意，但現在想起來，先生當時是相當用心的，既考慮了圖書館業務的需要，也想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學科背景，甚至還兼顧了個人的興趣與性格，從教育與培養的人才的觀點來說，是很圓滿的。特別是在接受圖書館學的教育過程中，自己能親身感受到實際工作上的需求，對學生是有很大幫助的，使得學生的瞭解與思考不會與圖書館工作脫節，從而能有完美的結合。慰堂先生對於實習的重視，應是圖書館學教育的特質，而今卻常常被遺忘，從未曾對實習給予適當的重視，連同對教育效果發生不良的影響。慰堂先生這一點堅持，是值得思考的。

第二點是素質在圖書館學教育過程中的重要性。在圖書館學的相關著述中，我們常看到圖書館員素質的問題，被熱烈地討論著。大家都會同意，圖書館員素質會直接影響到圖書館工作的成效，但是圖書館員的素質高低，到底如何判定，彼此之間的意見，就莫衷一是了。其實，所謂素質的優劣，應該根據工作所需的能力，來作為評定的標準，換句話說，擔任圖書館員總有一些基本的能力，是我們必須具備的。這些基本條件，不但有「面」的要求，也有「質」的水準，所謂「面」的要求，就是有些非具備不可的能力，缺少了就會發生影響；至所謂「質」的水準，就是這些能力，還要達到一定的程度，水準不夠，也會影響工作的成效。那麼這裡所說的「面」和「質」的內涵，應該就是圖書館學教育所一定要追求的目標，至於對這些內涵的認知，恐怕就要根據工作的內容來思考了。現今圖書館員的工作強調的是為讀者服務，故讀者是我們服務的對象。我們所用以服務讀者的，是可見報的，包括一些過去的圖書，加上後來許多非書本資料，如今更有時髦的電子出版品。然而，這些不同的媒體，只是一個媒介而已，我們所真正提供給讀者的，是在媒體中所記載的知識，當今稱之為資訊。圖書館員的工作至此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在讀者、知識、資訊之間擔當一個仲介的角色。因此，圖書館員除了對知識及知識的內涵有充分的瞭解外，還必須瞭解讀者需要什麼樣的知識，才能將適當的知識，在適當的時候，提供給適當的讀者。當然，知識的檢索，知識的傳輸，知識的儲存，這些技術因新科技的應用已相當發達，如何能有效掌握知識的內容，恐怕才是圖書館員最需要具備的條件。因此，慰堂先生希望招收的碩士班學生，是來自於其他科系，才能素質更往上提升，他在這一方面是有見地、有堅持的，並在當時還在不太可能的情況下實現了這一理念。這讓

我們想起，圖書館學教育近年來一直在追求升級，現在已經從學士班、碩士班至博士班，可謂體系完整，但是素質有無提升，還有待觀察。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將圖書館學校提升到碩士班以後，除了在學位上提升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圖書館員，每一個人都有著不同的學科背景，在對知識的瞭解上，他們有了不同學科範疇的人員，可以說是素質的提升和知識領域的拓寬，十分可貴。

再次是慰堂先生在經營圖書館中，高度發揚了創業的精神。在四十多年前，政府遷台不久，臺灣光復未滿十年，百廢待興，財政困難，圖書館事業一切因陋就簡，若要求政府撥發多少經費供中央圖書館在台復館之用，是不太可能的，就連館址設在何處，都是慰堂先生親自訪求。後來先生看中了在植物園裡日本人留下的一座不蔽風雨的破舊神社建築（在當時是國語日報的社址，據說為了要國語日報遷讓，還和多年前的老同學何容先生不太開心）。那樣一個破舊的神社，完全沒有一點是合乎圖書館建築的要求，卻被慰堂先生在幾年之間，一點一點地改建，儼然成為一個國家圖書館的建築。慰堂先生對於他的建築理念，還說得頭頭是道，包括中間一個水池，四周房舍一氣連貫，再將圖書館的各業務單位依序安排其中，這不正適合圖書館建築的需求？當然，要和現在中山南路的國家圖書館的建築相比，是無法同日而語的。中山南路的館舍，受到眾口一辭地讚揚，設計和起造的過程中，主事者奉獻的心力，所表現的才華和能力，也是大家所一致稱許的。但南海路館舍與中山南路館舍建造過程完全不同，中山南路的館舍像寫文章一樣，從命題、構思、遣詞、用字、到完成是一氣呵成；南海路的館舍則是從廢墟一般的建築，一磚一瓦地補修和改建，一方面要遷就舊

有的部分，一方面心中還要自有盤算、設想，否則將來如何能像一個圖書館？因此，回憶起慰堂先生當年所花的心力，真是讓人覺得肅然起敬。對比現今的圖書館員，每每將圖書館經營得不理想歸咎於經費不足。當然，經費不足會使圖書館經營受影響，但其實任何一位當過主管的人都知道，天下從沒有經費寬裕得讓我們覺得滿意的時候，我們惟一的辦法，是學會將每一文錢都花在刀口上。把錢花對，發揮最好的效果，是管理上的最高境界。如果沒有學會花錢，再多的錢，也都會覺得不夠，也許現在社會富裕了，大家不覺得應該這麼認真，但當年的情況，是後人無法想像的。慰堂先生的這種創業精神至今仍然是值得景仰、學習的，特別是在圖書館未能讓社會大眾、政府官員充分瞭解的今日，我們更需要將經費運用得恰當，呈現最好的效果，才能促成圖書館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慰堂先生雖離我們而去，但是他老人家的精神，卻是我們永遠的表率 and 榜樣，他老人家對臺灣圖書館事業奠基的貢獻，更是我們永遠不該忘記的。要想作完整的記載相當困難，謹就個人感受最深的，舉幾例以茲紀念 先生百年誕辰。

（本文由本書編著者提供）

盧荷生（一九三一—二〇一一）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知名圖書館學專家、教育家。曾任職於中央圖書館擔任編輯、代理總務主任，後任教於北一女中、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慰堂先生與清史研究

陳捷先

我在臺灣住了五十年，在這半個世紀之中，有很多師長、前輩和好友是值得我感恩與懷念的，蔣慰堂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蔣先生是圖書館學界的名家，是傑出的行政官員，他的事功成就已經有不少人談到了，我現在只就他對近代臺灣清史研究方面所做的貢獻，寫出一些個人親身經歷的事實。

早在本世紀的五〇年代，臺灣仍被稱為「文化沙漠」，而中國大陸正在混亂之時，國際學術界對日本的清史研究給予很高的評價，尤其是美國治清史的前輩，如 John K. Fairbank、Mary Wright 等等，他們都認為東京與京都都是清史研究的兩大中心。無論是滿文老檔或是硃批諭旨，日本學者確已有了相當的水準與成績，出版了可觀的專書與論文，而當時的臺灣在這些領域中幾乎是一片空白，乏善可陳。事實上，臺灣的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以及各大圖書館多珍藏極豐富的清宮檔冊與善本圖書，只是當時學術環境剛剛恢復，經濟起步振興，做出的成績不多。不過，自民國五十四年故宮博物院遷址臺北之後，在慰堂先生的主持下，不但院務發展一日千里，使故宮博物院揚名國際；清史研究也藉由故宮博物院的多項努力，使臺灣在國際學術界的知名度大為提高，以下